

聚焦良政善治 開啟香港政治新局面

閻 小 駿

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學教授萨繆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一生曾提出過西方政治學中許多極為重要的論斷。在 1968 年出版的《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一書中，亨廷頓於開篇即明確提出的，「國家間最重要的區別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即是一例。

1968 年是二十世紀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布拉格之春」，法國發生了被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稱之為「社會革命」的「五月風暴」，越共領導的民族解放陣線在春季攻勢中一度攻入親美南越政權首都西貢，美國國會廢除了「金本位」儲備制度，日本則慶祝了明治維新 100 週年。這一年，法國爆炸了氫彈、成為中蘇美英之外第五個熱核國家，美國的「阿波羅八號」任務首次進入月球軌道並實現繞月十週，而中國內地則成立了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悄然啟動載人航天醫學研究……在人類意識形態鬥爭和政體競爭的高峰時刻，亨廷頓氏明確提出現代政治的核心評判標準應是治理的成效、而非意識形態標籤，這是難能可貴的遠見卓識。

以治理的成效而非意識形態標籤來作為觀察政治的核心標

準，是理之必然。西方政治學各流派雖對國家（有組織的公權力）之產生源頭眾說紛紜，但一個基本共識則是國家的誕生目的是旨在解決人類公共生活中的秩序缺失問題；有組織的公權力—主權國家—為無序的人類社群生活提供了秩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具有公共性質的「治理」。

正如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維坦》中所言，主權國家改變了史前時期人與人之間如同「狼和狼之間的關係」，正式宣告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結束，人類生命不再「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又短暫」（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而進入了有秩序、有道德、穩定的國家政治生活。實現良好的治理，確保人類公共生活在主權管治下的穩定性，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共同目標，也是人類之所以得以存續及繁榮的主要原因。

追根溯源，儘管具體的政體形式千變萬化，考察一個政治體治理水平的核心標準和尺度，必然也必須是「管治的程度」和治理的效果。公共生活的質素、政府治理的成效歸根結底體現在廣大民眾親身可以感知到的秩序感、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無論對於政府、政黨還是代議士，民眾的福祉都是公共治理的出發點，是政治活動的基本依歸，亦是社會發展的中心目標。就世界範圍而言，只要這個出發點和中心目標不受到極端化意識形態干擾的國家或地區，治理的效度往往處於令人滿意的水準；而在這個出

發點和中心目標受到極端化意識形態、種族矛盾或分離主義等消極勢力嚴重牽制的地方，治理效度往往不盡如人意，有些地方甚至淪入了「失敗國家」的陷阱。此消彼長中呈現出的歷史大趨勢，發人深省。

香港長期以來是國際意識形態鬥爭和「標籤化」政治生態的受害者。本來，政治制度的設置不是做擺設，而是要實實在在管用，要能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兩個維度上給民衆帶來切實保障。但由於在整個二十世紀，香港先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對亞洲擴張的最前沿，後又成為東西方陣營間意識形態冷戰鬥爭的最前線，兩相疊加，造成了香港社會一部分人士對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及公共事務的看法，往往不是以「治理」效度為標準，而是習慣性地以「意識形態」色彩為標籤。這些以意識形態標籤論人論事的作法，或者以意識形態臆想決定行動方針的短視，最終結成的苦果則是整體社會出現政治上失序、經濟上困頓、社會面撕裂、文化教育領域極端化的不幸景況，甚至一度走進了全面「泛政治化」的泥沼，其中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

2019年，在內外複雜因素交織影響下，香港發生了較長時間的社會風波。目前，由亂到治、由治而興的歷史轉折已經開始；但療治世道人心、癒合社會撕裂、促進人心回歸，尚待長期的艱苦努力。而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實現最大範圍的政治團結，開闢新的政治局面，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社會各界要重新回到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為中心的政治討論中來，集思廣

益，以民為本，深入思考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未得到解決的各類民生問題。這亦要求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各派別乃至國際社會各「持份者」在確保本港政治社會大局穩定這個關鍵點上找到「最大公約數」，在確立良政善治這一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畫出「最大同心圓」。

確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標有利於特區經完善後的政治制度在實踐中穩健運行，有利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效開展工作、協調各方、實現治理目標，是香港保持經濟發展、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本前提條件，更是廣大香港居民安居樂業、實現心中理想所必須的環境保障。確保政治社會大局穩定、確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標這兩項關鍵議程，理當成為香港處於政治光譜不同位置、具有不同政治抱負的各界人士之間達致政治團結的共識基礎。

當前，對本港政治社會大局穩定構成威脅的潛在對抗性元素居於社會關係網絡的不同節點，需依法加以認真辨識、甄別及應對。但正如王陽明先生在《與楊仕德薛尚謙書》中所寫，「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如何通過有效的溝通工作和有說服力的良政善治成效，來團結在理念、信仰甚至價值觀層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及國家治理香港基本方略存在懷疑、抵觸甚或「軟抵抗」情緒的人士，是我們時代對治港者隊伍提出的一項需要用實踐來回答的新的艱鉅課題。在維護政治社會大局穩定這個基礎性、全局性問題上，我們務必「常懷遠慮、居安思危，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致廣大而盡精微』」。

香港地處東西之間，華洋雜處，歷史記憶及社會成分都極為駁雜，大家觀點各異、理念不一，即便在通常所認為的「建制派」內部也存在這樣那樣的歷史芥蒂、利益糾葛和政治主張，這不足為奇，也是必須予以尊重的現實情況。但無論身在香港社會哪個位置、處於政治光譜的哪個點位，大家所具有的最大共同特徵是都以香港為家，希望香港這個「家」更美好、更安定、更繁榮、更開放。「家和萬事興」。相信只要我們化除畛域，戮力同心，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開闢出新的天地，繼續成為中國版圖上別具魅力的偉大國際都市。

（本文發表於 2022 年 1 月 24 日明報觀點版）